

李喜所 元青著

梁启超传

人
民
出
版
社

李喜所
元青著

梁启超传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王师颀

梁 启 超 传

LIANGQICHAO ZHUAN

李喜所 元青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100706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375印张 480,000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01-001516-3/K·375 定价16.60元

引 言

——我眼中的梁启超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自觉不自觉地塑造自己的形象。令人玩味的是，人类如此众多，却绝难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因而，绝对准确地去描述任何一个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讲不通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古人，即使所依据的史料百分之百的准确，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价值取向有别，学术水平各异，所写出的人物传记也不可能完整无误，更难使古人呼之欲出，形象逼真。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了解和认识是相对的，再现历史人物形象则更是有限度的。尤其是那些历史伟人，性格复杂，活动频繁，思想活跃，智慧超群，后人认识起来就更困难一些。本书的传主梁启超，从1873年出生到1929年谢世，虽只度过了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主编《新民丛报》，为一代青年创造精神食粮；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曾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五四之后又潜心研究中西文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地讲学，并写出了一批学贯中西、令人叹服的学术专著，堪称一代宗师。为如此博学多才又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立传，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本书只能是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绝不敢自诩为准确无误地再现了梁启超。故戏之曰：我眼中的梁启超。

人在谱写自己历史的过程中，受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关

系、人文景观所制约，在大气候相同的情况下，人的个性就具有决定意义。人物传记首先应是个性化的历史。梁启超一生多欲、多才、多思、多情、多变，争强好胜，从不满足，喜欢并善于表现自己，总想在剧烈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选择自己的最佳定位，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中国。这种创造型的个性左右了其开拓性的人生。

强烈的欲望是梁启超的人生支柱。他视“希望”为成功之母，总是对他所追求的一切抱定必胜的信念；他把“兴趣”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总是对他所干的一切抱有浓厚的兴趣。受中国知识界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千方百计在政坛角逐。童年时期，梁启超就有献身祖国的宏图大志，1890年在广州遇康有为后，更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其政治欲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强了。1902年前后，其思想渐渐突破康有为的框架，自成一体，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模式进一步完善。1912年，他结束了14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决心在政界一试其锋。此后的8年中，梁启超沉浮于扑朔迷离的政潮而不能自拔。晚年他虽宣布脱离政界，但从未远离政治，“五四”之后的各种政治风云，梁启超总爱指手画脚，评论一翻。对于一个潜心学术又在政治上屡遭惨败的文人来讲，始终保持这样饱满的政治热情，是难能可贵的。和政治欲相比，梁启超的学问欲更旺盛。其一生几乎天天在作学问，即使涉足政坛的岁月里，也从未停止发表学术论文。他对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图书文献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一般人少有的兴致，写出了有相当水平的论著。在那精神亢奋的年月，他一天可以写5000多言，一生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巨著。一部《饮冰室合集》，倾注了梁启超刻苦攻读、勤奋著述的斑斑

血泪，也反映了他广博的学术文化知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梁作学问，一是求新，从不炒“冷饭”，更反对人云亦云，始终选择中西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拥有众多的读者；二是求通，梁无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总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议论风生，给人启迪，其是通才，而非专才；三是求多，总以“不知为耻”，只要梁研究的问题一定要写出论著，其好友曾劝他专精一门或两门，求深不求广，他也知道自己作学问广博有余，专深不足，一度下决心调整战略，但兴趣的广泛，能力的超群，决定了他无法只专一门，而是以多取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个性。梁启超的这种多欲，是和多才、多思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能作出成绩。他天赋好，又勤奋，病危住院，还伏案著《辛稼轩年谱》；他思维敏捷，善于观察社会和探求人生，新思想层出不穷。才、学、识的有机结合，使梁成为著名的思想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是一“情种”。①他无论从政、作学问，还是交友、持家，一个“情”字贯彻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其城府欠深，易于激动，知心好友认为他不适合从政，梁开始不服，后来屡屡败北后，也不得不认可。他写文章，笔锋常带感情，富于“魔力”，透过梁创造的活泼流畅动人的“新民体”，可以感触到其跳动的激情。在爱情生活上，梁也一度为窈窕少女的真情所动，但始终坚持中国式的诚挚而一以贯之的夫妻感情。梁对儿女一往情深，关心子女的生活、学习、为人、择业，现存的梁致儿女们的几百封书信，说明他是一位好父亲。尤其对大女儿梁思顺（令娴），梁视为掌上明珠，体现了无价的父爱，真可谓“儿

① 梁自称：“余生平爱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辄沉溺之，无论美事、恶事皆然，此余爱性最短处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91页）

女情长”。

梁启超“流质易变”，总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他也承认，其师康有为“太有成见”，而他则“太无成见”。有些论者将梁一生归之为“十变”，也有的概括为“七变”、“八变”。总之，梁启超的多变是肯定无疑的。需要探讨的是梁为什么如此多变。不少论者从梁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上去找原因，还有的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去寻答案。理由是，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薄弱，缺少独立意识，其代言人肯定软弱多变；而近代中国又风云突变，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过时了，这一时期是新潮为人们追逐，过不了多久就黯然失色而被抛弃，一浪一浪的迅速推进，使总想站在潮头的梁启超不得不变。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深入一步去看，梁的多变还有深刻的思想和政治原因，特别和他追求的改良主义始终不变有因果关系。梁启超一生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通过改良的方法，设议院，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之前，先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开明专制，通过开明专制达到君主立宪。在表达这一意愿时，梁有时抨击封建专制，呼喊资产阶级民主；有时又哀叹民智未开，为开明专制评功摆好。似乎他一会儿是民主的代言人，一会儿又是封建的卫道士。而且，书生搞改良，只能寻靠山。像梁启超这样的文人参政，无非是写文章，造舆论，办学堂，搞学会，组团体，若要真正实现其宏图大志，必须寻求强有力的实力派的支持。梁戊戌时和光绪等帝党联合，武昌起义后又投靠袁世凯，和袁闹翻后又去寻段祺瑞，待看清段的庐山真面目后，梁再也物色不到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强人”了，于是不得不在故纸堆里寻求解脱。梁这样四处寻靠山，自然就变化不一了。从理论上讲，改良本身就是一矛盾结合体。改良主义者一方面要突破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保留

传统，维护旧政权。在强调破旧的时候，有很大的进取性；在要求保存旧事物、反对革命的时候，又表现出极强的守旧性。所以，只要奉行改良主义，就处于左右摇摆的多变之中。梁一生就置身于这种无法自拔的矛盾当中。梁启超改良主义宗旨的始终不变，决定了他实施过程中的多变。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的所谓“不变”，实际是因为他已不全面坚持他的改良主义目标了，他所梦想的只是拥护光绪帝复辟，延续清朝的统治。至于实现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康有为似乎忘却了。

梁启超的一生是喜剧，还是悲剧？应是喜剧色彩，悲剧性格。他留下那么多的宏篇巨著，领导过戊戌变法，又是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应该说不虚此生；但他一生所干的事几乎都没有成功，其心境多在愁若和忧愤之中，晚年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对前途都绝望了。近代中国这个悲剧舞台，决定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决定了梁启超的悲剧性格。一位外国学者称梁一生在政治上和学术文化上画了一个圆，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此话虽难令人信服，但发人深思。

目 录

引言——我眼中的梁启超	(1)
一 寻根	(1)
家乡风情	(1)
家世沿革	(7)
家庭素描	(10)
二 流水年华	(17)
幼年的足印	(17)
中秀才——乳臭未干	(21)
成举人——翩翩一少年	(24)
三 康门高足	(28)
拜师康“圣人”	(28)
新潮激荡的万木草堂	(34)
敞开思想的窗扉	(39)
四 初涉政治舞台	(44)
公车上书	(44)
组织强学会	(49)
《时务报》主笔	(53)
执教湖南时务学堂	(61)
联志士，建社团	(67)
五 维新大思路	(75)
讲进化	(75)
开民智	(80)
变科举	(86)

兴民权	(91)
设议院	(96)
六 站在变法的潮头	(102)
维新运动的高涨	(102)
保国会	(109)
全力推进新政	(114)
激烈的新旧之争	(119)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123)
七 亡命与奋进	(129)
忍泪逃出国门	(129)
支持自立军起义	(133)
办学和办报	(137)
“言论界之骄子”	(144)
漫游新大陆	(152)
和孙中山的交往	(158)
八 构筑新文化的新星	(163)
新星的崛起	(163)
政治文化	(170)
经济文化	(179)
法律文化	(185)
宗教文化	(193)
社会文化	(198)
学术文化	(206)
九 死战革命党	(222)
迈向改良的脚步	(222)
政治革命论	(230)
“开明专制”论	(236)
反“社会革命”论	(240)
事与愿违	(245)

十 为宪政运动推波助澜	(250)
立宪运动的兴起	(250)
政闻社及其活动	(253)
宪政运动的灵魂	(262)
关注财政和外交	(263)
十一 武昌起义后的抉择	(274)
新形势·新对策	(274)
初返国土	(282)
中国建设问题	(285)
联袁的前前后后	(292)
结束流亡生涯	(299)
十二 与袁世凯握手合作	(304)
鼓吹“国权主义”	(304)
政团林立中的进步党魁	(310)
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	(318)
改革司法	(326)
币制局总裁的苦衷	(330)
袖手旁观	(334)
十三 挥泪反袁	(338)
猖獗一时的帝制逆流	(333)
批评与幻想	(343)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350)
为何要反袁	(358)
十四 护国运动的主帅	(363)
发动起义	(363)
潜入广西	(372)
促成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	(379)
迫袁退位	(384)
结束护国战争	(390)

痛悼蔡松坡	(399)
十五 在政潮的漩涡中沉浮	(402)
研究系的首脑	(402)
力主对德宣战	(403)
反对张勋复辟	(415)
站在康有为的对面	(421)
出任段阁财长	(428)
十六 漫游欧洲	(437)
告别官场	(437)
详察泰西世界	(440)
活跃于巴黎和会	(445)
融合中西文明	(450)
十七 无法改变的参政热情	(458)
主编《改造》杂志	(458)
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潮	(461)
鼓吹国民运动	(470)
呼吁“联省自治”	(477)
调和“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482)
幻想组织第三党	(435)
十八 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	(490)
办学与讲学	(490)
推进文化交流	(501)
著书立说	(510)
十九 流传千古的学术成果	(515)
治史以求新为本	(515)
刻意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学	(539)
努力构筑自身的哲学流派	(556)
对古圣贤思想的评议	(574)
学术史研究中的创见	(592)

文化史研究中的建树·····	(607)
在佛学的海洋里寻觅·····	(619)
一批有价值的图书文献学论著 ·····	(636)
教育学 ·····	(643)
系统的办报学说 ·····	(653)
二十 仙逝 ·····	(662)
后记 ·····	(670)

一、寻 根

家 乡 风 情

梁启超的家乡坐落在南国水乡——广东省新会县的茶坑村。

新会县位于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距花城广州100多公里，多为冲积平原和小山丘，西汉时称四会县，晋更为盆允县，南朝刘宋时置新会郡，隋朝废郡改县，因袭至今。从新会县城往南，过大作家巴金所描绘的“小鸟天堂”，约二三十公里，便是茶坑村。这里正当西江入海之冲，居河海相隔而成的7小島中央，无怪乎梁启超自称为“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①

茶坑村有100多户人家，5000余人。村前一清澈见底的小河缓缓流过，时有风行的帆船飞驶；村后一布满松柏竹林的小山拔地而起，游人清脆的歌声此伏彼起。山上有一建于明代的凌云塔，雄伟壮观。立于塔

^①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11。

旁，珠江三角洲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南海潮的冲天巨浪，隐约可见。可以设想，青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常绕塔漫步，思潮起伏，叹人生之艰辛，思祖国之兴衰，念天地之悠悠。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少寒多暑，炎热潮湿，严冬无雪，花开四季，稻花香气逼人，桑园郁郁葱葱，柑橘、香蕉等水果挂满树枝，著名的大葵扇行销全国。但时有台风侵扰，人祸、天灾亦不断袭来，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其县志记云：“新会气候，一岁之间暑热过半，冬无霰雪，草木不凋。一日之间，雨暘寒暑，顷刻则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尤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猝起俄顷。濒海地阜土薄，故阳煖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境之西南多农鲜贾，依山濒海者，以薪炭耕渔为业。民无积聚而多贫”。^①

社会环境往往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习性。从晚清的各种文献来观察，长期生活在茶坑一带的乡民具有顽强的生活能力，善于应付各种突然事变，勤劳俭朴，务实、求新、自治、爱乡，崇尚封建义理，信神鬼而不乏迷信思想，尊重知识分子，向往升官发财。诚如《新会县志》所云：“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士者以恬退为乐，竞进为耻；尚门第，矜气节，慷慨好义，无所谄屈”。这种风俗，即使在有了很大变异的梁启超身上，也曲折地有某种反映。

清末的茶坑村实行一种带有自治色彩的乡绅保甲制度。在梁氏宗祠的“叠绳堂”设有本村的最高权力机关——耆老会，由51岁以上的老者充任，年轻的秀才、举人亦可为会员。耆老会亦称“上祠堂”，聘任4至6名年轻力壮能办事的男子为值事，其中2人为会计，管理全村财务税收，另举保长1人，“专以应官”，

^① 《气候节》，《新会县志》卷2。

但“身份甚卑，未及年者则不得列席耆老会议”。耆老会一般有会员六七十人，但开会时有一半多人不出席，权力实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和办具体事务的值班和保长手中，梁启超的父亲就曾掌握耆老会30多年。据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记述：“耆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班，秋季会主要事项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班交代，开秋祭会时或延长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开会。大率每年开会总在20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

耆老会设有自己的地方武装——乡团，由敢于争斗的小青年自愿报名，耆老会批准。团民备受优待，分东西时可领双份。每人或数人发一支枪，弹药则由值班统一保管。有盗卖枪枝弹药者，必从重处罚。乡团定时操练，学一些武术和作战技能，有一定的战斗力。在维护茶坑村封建秩序和地主阶级统治方面，乡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遇外来侵略，又发挥了组织民众、保家卫乡的积极作用。清末的乡团是较复杂而多变的乡村武装集团。

茶坑村还设有江南会，类似于今天的农村供销社，乡民自愿集资，购买较为急需的布匹日用百货及柴米油盐等，方便百姓，扩大交流。三五年后，所得利润少量还给会员，早还者利少，晚还者利多，一般30年内还清。余下的利润多充公，用于村中公益事业。春秋之季，江南会还贩运肥料和农具，颇受乡民欢迎。一些善于交往又经营有方的村民，积极插足江南会中，借以渔利，偶有“以赤贫起家而致中产者”。可见新会地区的乡村贸易还是较为发达的，这是清末商品经济的勃兴在一个小角落的典型反映。

耆老会的主要收入是“赏田”。凡是村里新开垦和淤积的土地，一律归耆老会掌管，通常情况下有近10顷。耕种这些土地的

农户，每年要交10%的地租。每到年初，很多人争着租地，竞争十分激烈，说明茶坑村的土地并不富裕，也透露出这里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较多。如果欠租，是绝对得不到下一年的耕种权的。此外，茶坑的乡民对祭神拜佛和祭祀祖先十分重视，所用的财物大都落入耆老会手中。耆老会利用百姓的这种心理，也拿出一部分钱来杀猪拜神祭祖，并把祭完的肉（胙）分给村民。村民则把分胙的多寡视为一种殊荣，若得双份者，即光荣之至，若不分者，是莫大的耻辱。尤其是春节，分胙是梁启超家乡最热闹而又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耆老会最繁忙的事务是处理民事纠纷。“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会判；不服，则诉诸分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诉于官矣。然不服叠绳堂之判决而兴诉，乡人认为不道德，故行者稀少。子弟犯法，如聚赌斗殴之类，小者上祠堂申斥，大者在神龛前跪领鞭打，再大者停胙一季或一年，更大者革胙。停胙者逾期即复，革胙者非经下次会议免除其罚不得复胙，故革胙为极重刑罚”。犯有盗窃罪者，绑起来在全村游街示众，任人嘲骂，最少要停胙一年。犯有奸淫罪者，则要把全村所有的猪都杀完，把肉分给每户，钱全由犯罪者偿付，美其名曰“倒猪”。

茶坑村的公益事业，多由耆老会组织。如河流的整修，由耆老会调配全村18岁以上51岁以下的劳力开挖，若不出工者必须出钱。乡村儿童的教育，耆老会组织了几位识字人，开了三四所私塾，以各祠堂为教室。教师工钱多者30余元，少者几升米，全村分肉时可拿双份，“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之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茶坑村的娱乐活动，以正月十五放灯和七月祭神为最热闹。“其费例由各人乐捐，不足则归叠绳堂包圆。每三年或五年演戏一次，其费大率由三